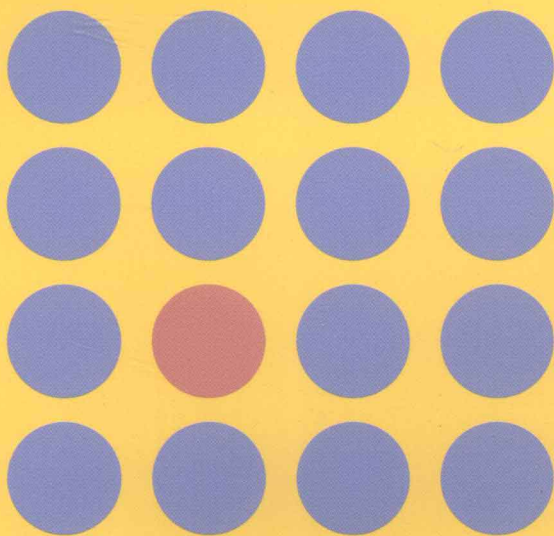


中国体育博士文丛

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 一个村落舞龙活动变迁的启示

涂传飞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中国体育博士文丛

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

——一个村落舞龙活动变迁的启示

涂传飞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郭英俊
责任编辑：李志诚
审稿编辑：梁 林
责任校对：林学芹
版式设计：司 维
责任印制：陈 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一个村落舞龙活动变迁的启示/涂传飞著.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644-0630-1

I. ①农… II. ①涂… III. ①农村—民族形式体育—文化—
研究—中国 IV. ①G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1876号

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一个村落舞龙活动变迁的启示 涂传飞 著

出 版：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海淀区信息路48号
邮 编：100084
邮 购 部：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010-62989432
发 行 部：010-62989320
网 址：www.bsup.cn
印 刷：北京市昌平阳坊精工印刷厂
开 本：787x1092毫米 1/16
印 张：12.5

201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传飞的博士论文经修改补充后，现在就要出版了。传飞要我写几句话，我也想就其书的出版说几句，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传飞硕士师从余万予教授，其研究方向是传统体育文化，余教授为传飞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2006年，传飞考上博士，成为我的学生。如何在余先生奠定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就成为我们师徒共同努力的目标。读书自然成为首选，或许他读书的数量不及其他同学多，但会读书、读得精是传飞的一个特点。他并不满足于作者的现成结论，而是力图解构作者的论证过程，厘清作者的研究思路，考究作者选择研究方法的依据，并对照自己的研究进行检讨。几年下来，其进步在《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一个村落舞龙活动变迁的启示》中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引起国人关注还是20世纪初，当国人在寻求“救亡图存”的方策过程中，认识到我国固有的体育形式实用价值时，就开始对我国固有的体育形式进行整理研究。其主要成果有：王怀琪对传统养生术的整理，蒋维乔对静坐原理的阐释，马良对武术教法的改进、创编“新武术”，武术列入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和组织武术“运动会”以及建立国术馆系统等。这一时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主要是运用西方传入的一些现代体育原理去发掘、阐释我国固有体育形式的“体育价值”，按照西方现代体育的组织方式规范、整理我国固有的体育形式，其目的是为我国固有的体育形式争取到在中国现代体育发展中的地位。这一基本特征直到新中国成

立，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发展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十分关心。在普及工农大众体育的活动中，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于1952年在天津举办了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会（后来被追认为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武术推广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反封建迷信和反动会道门的运动中，民间武术活动和一些传统的民俗、民间活动受到限制。武术开展也主要局限在一些由国家整理的“套路”，如简化太极拳和适应学校教学的一些长拳类。民间习武，虽未完全禁绝，但大多转入“地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民族、民俗活动被列为封建糟粕而遭受灭顶之灾。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固有体育形式的研究，主要是依据现代体育的原理，进行了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项目”整理或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接续被中断或歪曲的文化传统，抢救面临消亡的文化遗产，政府推动了编写地方志和武术挖整工作。国家体委组建了“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和“武术研究院”，具体负责指导这两项工作。同时还恢复了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民族、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除了继续沿袭“去粗取精”的项目整理、创新外，更多的人则转向到开发利用传统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方面以及民族、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如何“现代化”的讨论中。改革初期，民族民俗体育的研究主要呈现出挖掘整理与开发利用的特征。这是大多数传统体育文化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取向。

正是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讨论中，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的“文化取向”被提了出来。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的现代化是否就是“奥林匹克化”？按照现代体育模式改造民族传统体育是否就是传统体育文化的出路？这些问题的提出，使部分研究者改变了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审视角度，他们不再按照现代体育的文化取向去审视传统体育文化，而转向研究传统体育的文化意义与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以胡小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安于事实的调查、整理，在参考、吸收国外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摆脱“实证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以某个文化主体的视角去解读该文化体系的“意义结构”，进而揭示这个文化体系在其“生存环境”中的意义与价值。力图避免落入用现代体育标准的认知模式去解释传统体育文化的思维定势，通过“意义结构”的解读，探寻传统体育演进的规律。传飞的《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一个村落舞龙活动变迁的启示》一书，就是持这类研究取向取得的一个成果。

该研究以江西南昌县涂村舞龙活动为个案，全面考察了涂村舞龙的历史变迁，试图站在村民的立场，以村民的视角去理解舞龙活动在乡村生活中的意义，体察舞龙活动在乡村生活语境变迁中发生的渐变，整理舞龙活动在涂村演变的过程和轨迹，揭示舞龙活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和机制，从而解释当前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通过体察与解读，作者提出，涂村舞龙是一种仪式化的文化表现形式，其组织系统、活动流程、活动内容、符号意义，都显现出“舞龙活动”为涂村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再生机制，是乡村社会建构与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它主要体现在巩固族群认同、营造共同心理、实施传统教育、区别文化身份、强化社会秩序等方面。这种从总体上去把握、认识民俗体育文化在乡土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与功能，显然同“项目整理”相比，是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一个进步。

涂村舞龙活动的变迁是对社会变迁的反应。社会变迁最终会引起社会文化的变迁，但社会变迁并非是社会文化变迁最直接的动因，除非采取强力的政治控制。但这种强力政治控制下的“变迁”，只能变“事”，而不能变“心”。一遇适当的气候，被压抑的文化诉求，就会死灰复燃，甚至成为燎原之火。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主体的文化需求发生了改变。社会变迁正是通过改变文化主体的文化需求，而实现对社会文化的改变，这是我们从该研究中获得的另一个结论。显然，这个结论有助于我们改变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研究取向，对我们今天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也不无理论指导意义。

文化变迁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不变的文化或不可变的文化。民族传统文化要想在社会变迁的滚滚洪流中不被湮灭，就必须适应文化主体新的文化需求，契合到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建设中去。以不变应万变的“文化形态”至多只会成为一种“死去”的文化遗存，保留在民俗博物馆中。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的出路在于扩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内涵，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项目化”自然可以作为一个选项，但“项目化”则弱化了其文化功能，最终可能成为有其形而无其实的“身体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忧虑，该研究没有停留于涂村舞龙活动的解读，而是依据涂村舞龙活动演进提供的基本信息，结合古代奥运会的蜕变与延安秧歌剧的新生，探讨了传统民俗体育活动的变迁路径。该研究总结了四种可能的变迁路径：改变形式，保留功能和内容；改变内容，保留功能和形式；保留形式，移除功能与内容；保留形式，改变功能与内容。显然，这对我们进一步探讨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与发展的规律，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一个村落舞龙活动变迁的

启示》是近些年来运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研究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结合得比较好的研究成果。作者没有堆砌西方理论的学术概念，没有照搬西方学者研究的现成结论，没有在别人的研究范式中机械地填充中国素材，而是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深入乡土、深度访问、深度解读，力图整体把握涂村舞龙活动的真实含义与实际功能，从而找出导致涂村舞龙活动变迁的主要原因。由于研究方法的改变和视角的调整，该研究没有落入“政治、经济、文化”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叙事模式的俗套，使全书的结构显现出一些新意。该书还重点阐述了克利福德·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理论”及马塞尔·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对我们研究、认识和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启示，这对理解该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都无不助益。

涂村的“舞龙”被“游神”所取代而成为涂村的历史。目前“游神”也面临日渐式微的趋势。在全球化、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下，民俗体育文化如何守住自己的阵地，如何在社会变迁中重构其“意义结构”，以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当是民俗体育文化的出路。这不仅是本书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也是一切致力于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人的努力方向。

熊晓正
北京体育大学

摘 要

本书通过对涂村舞龙这个“地方性知识”的深度描写，在形而下的操作层面上从认识论基础入手，借鉴相关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作用与变迁进行了较完整的剖析。以此个案为基础，结合古奥运会到现代奥运会、旧秧歌到新秧歌以及传统龙舟到竞技龙舟的变迁事例，在形而上的理论构筑上归纳了民俗体育文化变迁规律和变迁路径。本书通过对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理论及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的系统梳理，对我国已有的民俗体育认识和研究方法论等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厘清。最后，本书提出当前重构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对策。主要观点有：

1. 民间体育是指存在于一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尚未高度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地开展的体育活动；传统体育是指人类业已创造的，经由历史凝聚而传承、流变的一种体育文化形式；民俗体育是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的一种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化、仪式化的传统体育文化体，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民族体育是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的所有民众或某一民族中特殊的民众群体所共同拥有和享用，并对其产生民族认同意识的一种传统体育文化。按照民间体育是否具有传统性的特点，可分为传统体育和非传统体育，传统体育又可以分为民俗体育和民族体育，民俗体育和民族体育大部分都交叉，但并不等同。

2. 从所调查个案来看，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变迁可

大致划分为传统期（1953年以前）、衰落期（1953～1966年）、退却期（1966～1978年）、重回期（1979～1997年）、再衰落期（2000年左右至今）。每个阶段的发展状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主体需求与民俗体育文化所承载的意义之间关系是否协调。

3. 从所调查的个案来看，民俗体育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社会经济再生产机制、一种社会教育再生产机制、一种社会心理再生产机制、一种文化身份再生产机制、一种社会空间再生产机制、一种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一种社会等级再生产机制，最终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由此当地社会得以建构和发展。

4. 民俗体育文化变迁规律是一个“民俗体育文化体——解构——移除或保留引入部分形式、内容和功能——重构——‘改变形式，保留内容和功能’或‘改变内容，保留形式和功能’或‘保留形式，改变内容和功能’或‘保留形式，移除内容和功能’”的动态过程。

5. 民俗体育文化变迁路径有“改变形式，保留内容和功能”“改变内容，保留形式和功能”“保留形式，改变内容和功能”“保留形式，移除内容和功能”等几种。

6. 当前重构农村民俗体育文化要注意以下几点：更新观念；处理好农民、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遵循民俗体育文化变迁规律；区别对待，选择不同发展路径；转换民俗体育文化的功能；突出自身的特色，注重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以符合民众的需求和促进世界体育文化发展为重构目标。

关键词：民俗体育文化；历史作用；变迁；规律；路径

目 录

1 前 言	(1)
1.1 选题依据与意义	(1)
1.2 理论背景与方法	(2)
1.3 概念界定	(12)
1.4 文献综述	(27)
1.5 研究架构	(40)
2 涂村舞龙变迁的个案考察	(41)
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41)
2.2 田野工作地点概述	(42)
2.3 涂村舞龙的历史变迁	(54)
3 对民俗体育历史作用的人类学阐述	(89)
3.1 作为社会再生产机制的民俗体育——涂村舞龙活动的民族志报告	(89)
3.2 对已有认识的检验	(98)
4 民俗体育文化变迁规律	(100)
4.1 社会自然环境变迁是导致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先决条件	(101)

4.2	社会变迁与民俗体育文化变迁并不是完全同步或同向的·····	(102)
4.3	文化主体需求的变迁是民俗体育文化变迁根本动因·····	(102)
4.4	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方式是“解构——重构”·····	(106)
4.5	“解构——重构”有三个向度·····	(107)
5	民俗体育文化变迁路径·····	(108)
5.1	改变形式,保留内容和功能·····	(108)
5.2	改变内容,保留形式和功能·····	(110)
5.3	保留形式,改变内容和功能·····	(116)
5.4	保留形式,移除内容和功能·····	(121)
5.5	简短的总结·····	(123)
6	对民俗体育文化意义的解释——阐释人类学对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启示·····	(125)
6.1	阐释人类学概述·····	(125)
6.2	对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启示·····	(127)
7	对行动的所有研究与观察都应该是总体的——来自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的启示·····	(141)
7.1	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概述·····	(141)
7.2	对我国民俗体育的启示·····	(142)
8	对今后重构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思考·····	(152)

8.1 对已有民俗体育认识的检视·····	(152)
8.2 对民俗体育发展实践的思考·····	(153)
8.3 对今后发展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思考·····	(155)
9 结论与建议·····	(160)
9.1 结 论·····	(160)
9.2 建 议·····	(161)
致 谢·····	(162)
参考文献·····	(164)

1 前 言

1.1 选题依据与意义

1.1.1 选题依据

中国正在高速地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从自然经济的中国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中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农村民俗体育文化所面临的处境非常严峻，如何发展农村民俗体育已经成为我们的重大课题。因此，对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研究也就显得更加紧迫与需要。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变迁与发展的问题，也有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宏观性的研究为主，扎实的、微观性的研究太少，目前有关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全面论述几乎没有。其次，民俗体育研究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又未能有效地学习和吸取与民俗体育有着密切关系的其他学科中的理论精华。第三，理论建构不足，富有预见性的、能够指导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理论极为贫乏。第四，虽然诸如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得到日益重视，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显得比较单一和落后。

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再也不能扮演一个被动角色，仅仅研究其变迁的后果。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见解，即我们必须加强对民俗体育文化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以减轻社会急剧变迁对民俗体育文化所普遍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要想在这方面取得成功，首先必须系统地研究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实际过程。只有这样，有用的预见性理论才能逐渐形成，才能够指导民俗体育文化的现实发展。

1.1.2 选题意义

1.1.2.1 现实意义

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日益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实践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如过于用商业化和奥林匹克化的标准来改造和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缺乏富有指导性的民俗体育文化理论来指导其发展等。本研究通过对民俗体育个案的深度描写，从理论上归纳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规律和变迁路径，检视当前我国农村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实践中存在的简单化和一刀切的做法，并提出了当前重构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建议。这既为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现实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也可有关部门制定农村体育和农村民俗体育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1.1.2.2 理论意义

(1) 对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和民族体育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全面的梳理，丰富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2) 从人类学的视角，借鉴相关理论，对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作用和价值进行再认定，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农村民俗体育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

(3) 从理论上归纳和提炼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规律和变迁路径，可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化民俗体育的基础理论研究。

(4)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阐释人类学的“深描”民族志法和社区研究法以及研究文化变迁的方法等，可以在方法论上为我国民俗（民族）体育研究提供些许启示。

1.2 理论背景与方法

1.2.1 理论背景

1.2.1.1 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理论

在文化变迁研究的切入点和具体操作上存在着宏观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种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以深描的民族志方法将文

化样本放置在流动的生活样态中，寻求文本背后的文化意义，从而将解释的不确定性和生活的不确定性并置于学术研究中，扩大了文化的解释空间。其深度描写方法透视的细枝末节的文化变化有助于理解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以格尔茨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特别是“深描”这一方法可运用到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来，深描和文化变迁在动态展示上具有契合点，而且在地方性文化研究中，阐释人类学在尊重他文化的前提条件下发挥了文化多样性的学术立场，并将生活本质和研究的终极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再使生活剥离于文化研究的范畴。而且，格尔茨主张在“深描”时，还应结合历史的考察对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提倡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即注重从历史变迁的视角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格尔兹主张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以及民族志撰写中，要将文化持有者的心理作为研究的一项重要维度，加以细心地观察并予以精心地描述。格尔兹认为：“（文化）有信仰、表达象征和价值框架，个人据其定义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情感、做出他们的判断。”^[1]按照他的观点，文化持有者的心理表现无不与其文化脉络息息相关，文化持有者通过心理表达的渠道将自我对仪式、事件、宗教的认知充分展现。格尔兹认为，只有深入到文化持有者的心理层面进行观察和描绘，才真正算得上是深度描写。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类文化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是一门解释的科学。从这个层次上看，格尔茨的真正成就在于他为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与视野——一个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以象征行动论为中心的文化理论和解释人类学的视野^[2]，从而实现了“一切学科都以研究人为出发点”的这一学术旨归。格尔茨的“深描”方法和对文化持有者的关注为本文在方法论上和研究视角上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格尔茨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初期，人类学界主要流行的理论是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心理学的功能主义（马林诺夫斯基）、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以及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米德）。这些理论都强调功能的作用，强调系统的平衡、社会的平稳和永久性的结构状态，对静态地研究一种文化的结构或文化因素的功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然而，这些理论忽视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其缺陷在于无法同等探讨社会过程与文化过程，对社会变迁的研究缺乏说服力。所以，格尔茨在《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一文中指出了上述功能主义理论的缺陷。格尔茨认为，社

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的是仪式强化个体间传统联系的作用以及注重通过仪式使一个群体的社会结构得以巩固和持续，并认为仪式等这类的象征系统是支撑社会价值观的基础。而社会心理学的功能主义则强调仪式对个体所发生的作用——它如何满足个体对世界的认知与情感需求以及在面临自然变故时如何满足个体保持内心安全感的需求。因此，虽然这两种理论都是对仪式（包括宗教）的社会和心理功能进行解释，但都偏好稳态平衡中的良好的社会整合，过分注重人们的社会惯例和习俗的功能方面，而忽视其隐含的功能失调方面。因此，这些理论无法处理社会变迁的问题，也就对变迁缺乏说服力。格尔兹以爪哇岛上的一次葬礼为例，对静态的功能主义理论无力处理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没有把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过程区别开来，而是把文化看作是社会组织“的镜像”或是把社会组织看作是文化的行为体现。针对这种缺陷，格尔兹提出将人类生活的文化与社会方面分析性地加以区别，并将其看成可以独立变化但又互相依存的因素，“文化是意义结构，依据它人类解释他们的经验并指导他们的行为；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文化与社会结构因而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的抽象”^[9]。在观察社会行动时，文化着眼于社会行动对于社会行动者的意义；社会结构着眼于它如何促进某种社会系统的运作。换言之，文化与社会是在相同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不同方面，前者为意义结构，行动者根据它来行动；而后者则是社会互动本身以及它采取的一种稳定的方式。由于文化与社会二者不统一，因此文化与社会和第三种因素——存在于文化主体中的需求或动机的整合模式之间就存在着内在的分离和断裂，这种文化与社会之间或文化、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不和谐与紧张，正是文化变迁的内在驱动力。随后以格尔兹以爪哇岛上的一次葬礼为例，一层一层地从印尼变迁后的宗教冲突、政治冲突以及住在城镇地区而仍保持着乡民意识的市民间的冲突等方面论证了葬礼仪式衰败的原因。他认为，葬礼仪式衰败主要是因为印尼的社会结构已发生变化，但作为意义结构的葬礼仪式却变化不大。因此，“社会结构（因果—功能）方面的整合形式与存在于文化（逻辑—意义）方面的整合形式之间的断裂”^[9]，即传统的文化结构与新近形成的社会互动模式产生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则来自在城市环境中仍坚守一种适合于乡民社会的宗教体制，它与新的社会互动模式相矛盾。所以，葬礼仪式没能按传统方式举行。农